

顾宏义 李文 整理标校

宋代日記叢編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代日记丛编/顾宏义,李文整理、标校. —上海:
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3. 7
ISBN 978-7-5458-0748-6

I. ①宋… II. ①顾… ②李… III. ①日记—研究—
中国—宋代—丛书 IV. ①I264.4-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32432 号

责任编辑 马丽娟
技术编辑 丁 多
装帧设计 鄢书径

宋代日记丛编

顾宏义 李 文 整理标校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 mm 1/32
印 张 41.5
字 数 780 000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458-0748-6/I·235
定 价 98.00 元(全三册)

前言

所谓日记，明人贺复徵曾定义为：“日记者，逐日所书，随意命笔，正以琐屑毕备为妙。”^①今日之定义如商务印书馆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认为日记即“天天记录生活经历的笔记”；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云日记即“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记录”。归纳诸说，即日记乃撰者本人逐日记录其所见、所闻、所历、所思。由此而与古人按日、月、年编录史事的编年体史书相区别。

关于日记的起源，历来说法不一，但普遍认同宋代是古代日记发展的重要时期，如陈左高先生所言，“从日记发展角度来看，萌芽于唐，发展于宋”。^②即有宋一代的日记撰作得到了飞跃式发展，而蔚为大观。如南宋人周焯于《清波杂志》中明言：北宋“元祐诸公皆有日记，凡榻前奏对语，及朝廷政事，所历官簿，一时人材贤否，书之惟详”。^③又自言道：“焯自四十以后，凡有行役，虽数日程，道路倥偬之际，亦有日记。以先人晚苦重听，如干盂次序、旅泊淹速、亲旧安否，

① （明）贺复徵：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六三九《日记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 陈左高：《历代日记丛谈》，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页。

③ （宋）周焯：《清波杂志》卷六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书之特详,用代缕缕之问。”^①而在周必大笔下,有士大夫撰述日记不止,死而后已者,如其《跋吕伯恭日记》云:

黄太史晚谪宜州,自崇宁四年起,但凡风雨寒暑,亲旧往复,以至日用饮食之类,皆系日书之,名曰《乙酉家乘》,止八月晦,九月则易簣矣。吕太史抱病东阳,亦有日记,起淳熙庚子春,尽辛丑七月壬寅,其明日遂卒,盖绝笔也。方病时,出入起居虽不逮山谷,而编《大事》首周敬王,修《读诗记》自《唐·无衣》,孜孜课程,所谓造次必于是者。两贤相去七十余载,何其相似也!意长日月短,悲夫!^②

其黄太史即黄庭坚,而吕太史乃指吕祖谦。由上可见日记在宋代士人学术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位置。也因为此,且两宋时期主张“内省”的理学大为发展,故逐日记录自己所见所闻、所行所思的日记这一著述体裁也颇得理学家的青睐,并为之制订了撰写日记的格式,称“日记式”。其中朱熹门人黄榦订立的“日记式”流传至今,载录如下:

日记:

圣贤之教,曰博学于文,约之以礼。又曰日知其所

^① 《清波杂志》卷九。

^② (宋)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卷四七《跋吕伯恭日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此录之所以作也。自旦至暮，自少至老，置之坐右，书以识之，文行相须，新故相寻，德进业广矣。

一记年月日：岁次，一行。

一记气节、寒暑、雨暘之变：天运，一行。

一记所寓之地：所寓，一行。

一记所习经子史集四书多少，随力所及：读书起止，四行。

一记所出入及所为大事：出入动作，三行。

一记所闻善言，所见善行：善言善行，三行。

一记所见宾友：宾友，三行。

先于孝友，人性本善，知识不明，故流而为恶。圣贤经训，所以勉人改过趋善，况儒衣儒冠，自当穷经博古，立志为学，而儒学莫先于读书。人身至贵，少有纵放，即流而为贱，戒谨恐惧，庶几寡过。事以勤而集，养以小而贱。人有一身，则仰事俯育，自有当为。是必鸡鸣而起，恐常不及，岂宜惰其四支，无所用心？用以俭而足，以奢而匮。人之一身，不过恶衣恶食，即免饥寒，不见可欲，此心不乱，岂宜纵耳目之好，以事无益？今百余年，更历三世，守此五事，常如一日。继今子孙，所宜永监，书之家庙，以示不忘。^①

^①（宋）黄榦：《勉斋集》卷三四《日记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由上黄榦所订立的“日记式”，颇可发见日记这一著述体裁与理学家“日省其身”的“内省”功夫之间的关系。但因岁月久远，依此“日记式”撰写的宋人日记并未见流传下来。但从现存宋人日记来看，其已较为严格地依照按日纪事、且将日期（或用于支记日）置于该日所记文字之首的日记体模式，同时不少日记还记录每日天气变化等，成为后世撰写日记的范式，而影响深远。故明代贺复徵由此有日记“始于欧公《于役志》、陆放翁《入蜀记》”之说。^①

宋代日记撰作虽已是大盛，但其名称并未能统一，故“日记”之外，也多取名“日录”之名，而以寓逐日记录之义。这“日记”、“日录”之名，也往往省称作“记”、“录”。此外，还有称“志”者，如欧阳修《于役志》；称“家乘”者，如黄庭坚《宜州乙酉家乘》；称“笔录”者，如赵鼎《建炎笔录》；或称“语录”、“别录”者，前者如陈襄《使辽语录》，后者如沈括《乙卯入国别录》等。而宋人为日记取名，有与内容直接相关者，如陆游《入蜀记》、赵抃《赵清献御试日记》、周必大《泛舟游山录》等。有以典故命名者，如路振出使辽朝的行程日记《乘轺录》之“轺”乃指轻便马车，引申为朝廷使节之坐车，故路振取以为日记名；而范成大自成都还家乡吴中的行程日记《吴船录》，乃取自杜甫诗《绝句四首》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之意。有以日记撰写时间命名的，如王安石的《熙宁日录》、吕祖谦的《庚子辛丑日记》等。有以日记撰写的地点命名

^① 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六三九。

者,如高永年《陇右日记》、晁公遯《箕山日记》等。还有不少日记是以撰者得名的,这大都是后人为区别他人日记而如此取名:如直接以撰者姓名取名,如刘摯《刘摯日记》、彭龟年《彭龟年日记》等,又王安石《熙宁日记》又名《王安石日记》。有以撰者之字取名的,如吕惠卿(字吉甫)《吕吉甫日记》、沈与求(字必先)《沈必先日记》等。有以撰者官衔取名的,如范祖禹《范太史日记》。有以撰者爵位取名者,如司马光《温公日记》,又王安石《熙宁日记》也称《舒王日记》等。有以撰者谥号取名者,如赵槩《赵康靖日记》、林希《林文节绍圣日记》等。一般而言,北宋日记多见以撰者来取名的,而南宋时以撰者来取名的日记则较为少见,由此也可见宋代日记之形式、体例等的变化与成熟。此外,需加说明的是,宋代以“日记”命名的著述并不一定是日记体著作,如韩滉《涧泉日记》之类即属笔记,而非逐日记事的日记。

宋人日记不但数量较唐代大增,而且不乏长篇巨帙之作,如存世的陆游《入蜀记》有六卷,曾布《曾公遗录》虽仅存残本三卷,却多达13万余字,已佚的王安石《熙宁日记》,据南宋书目著录竟多达八十卷。其他如司马光《温公日记》、周必大《思陵录》等都具有相当篇幅。

宋人日记的另一特点是其内容涉及面极为广泛,上至朝政大事,下至个人日常闲趣,乃至山川形势、道路迂曲、民风物产、士人交游、寒暑晴雨、草荣花香之类,无所不记,有如陈左高先生《中国日记史略》所云:“政治家论朝政,出使

者记行程,遣戍者叙贬谪,典试者谈科场,旅游者述行踪,随征者载战况。”总体而言,据宋人日记内容而大体可将其归纳为三大类:一,出使行游类。二,参政类。三,其他日记。本丛编收录两宋日记(包括存、残、辑佚)计 55 种,其中属出使行游类的有 29 种,属参政类的有 22 种,属其他类的有 4 种。当然有个别日记的内容实跨两类,此处乃据其主要性质而言。

一、出使行游类日记。

此类日记,据其撰写目的还可细分为出使与行游两小类。因两宋三百年间,先后与辽、西夏、金、蒙古(元)对峙,外交活动频繁,故而奉旨出使以及接待来使(称接伴、馆伴)的宋官员众多,按宋廷惯例,每位出使的使臣以及接伴、馆伴的官员在完成使命归朝后,均需递交一份例行的出使(或接伴、馆伴)语录,以介绍奉使行程途径山川地势、对方境内民间情况、与对方接待官员(或对方来使)的交往言谈以及奉使期间所探知的对方军政、经济、文化情报等。经今人考证,宋代出使语录之类著作可考者达 50 种左右,其中传世约 20 种。^① 因此,使臣以及随行人员一般都于行程中逐日撰写行程日记,以为撰写出使语录的资料准备。收入本丛编的出使类日记计 14 种,其中使辽的有路振《乘轺录》、陈襄《使辽语录》、沈括《乙卯入国别录》、张舜民《甲戌使辽录》等 4 种,接伴辽使的有吕希绩等《元祐七年正旦接送伴语

^① 参见刘浦江:《宋代使臣语录考》,载《10—13 实际中国文化的碰撞和融合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。

录》1种,使金日记有郑望之《靖康城下奉使录》、王绘《绍兴甲寅通和录》、范成大《揽轡录》、周輝《北辕录》、楼钥《北行日记》、程卓《使金录》等6种,馆伴金使的有倪思《重明节馆伴语录》1种,使元日记有严光大《祈请使行程记》1种,出使高丽的1种,即徐兢《使高丽录》。此类出使日记对每日之道路里程,所经城镇及其风俗文化历史都有记载,其中对出使接待礼节多有详尽描述,是了解两宋外交以及辽、金、高丽等社会政治的重要资料。

行游类日记可说是日记最为常见的形式。此类日记有属宦游所记,即官员赴任或入京途中所撰的行程日记,如赴贬谪之所的如欧阳修《于役志》、张舜民《郴行录》,赴任地方官的如郑刚中《西征道里记》、陆游《入蜀记》、范成大《驂鸾录》、《吴船录》,入京觐见天子的如周必大《奏事录》,罢官出京归家的如周必大《归庐陵日记》、《南归录》,计9种;有属纯为游山玩水或探亲访友而作的游览日记,如张礼《游城南记》、赵鼎臣《游山录》、周必大《闲居录》、《泛舟游山录》、吕祖谦《入越录》、《入闽录》,计6种。此类行游日记,因其撰写动机与出使类日记、参政类日记不同,较少政治色彩,而多随性而作,故能用笔自如,写景状物,描摹细腻,颇具个性,开后世游记日记之风,尤其是陆游《入蜀记》、范成大《吴船录》,更被后世奉为游记散文的典范。

唐李翱排日记事而成的《来南录》,世人多以为现存最早的行游类日记体著作,如薛福成曾指出:“日记及纪程诸书,权輿于李习之(翱)《来南录》、欧阳修《于役志》,厥体本

极简要。”^①但从文献记载情况分析,宋代行游类日记的盛行,其实与宋代出使类日记的大量产生有着直接关系,即将记载出使情况的行程日记用于记载官员赴任、行游经过,便是行游类日记,两者在形式上本无质的区别。

二、参政类日记。

参政类日记为宋代日记一大显著特色。宋代奉行“崇文抑武”国策,坚持文人治国,不少政治家又以文学家著名,他们于从政期间坚持撰写日记,详载朝中所见所闻以及个人政治立场,其内容上至朝中大事,下至家庭琐屑,于个人生活交际亦多有涉及。此类日记的撰写在北宋中期蔚为风气,如周焯所言“元祐诸公皆有日记”,其背后原因却与当时党争激化直接相关。在宋代有“国史凡几修,是非凡几易”的说法。^②此处“国史”乃指宋朝官修“正史”、“实录”等史书,因党争等原因,而屡加修改,致使其“是非”标准一易再易,成为党争中攻讦政敌的有效手段。而这些“正史”、“实录”的史料来源之一,即是由宰执高官所撰写的日记体著作。如周焯《清波杂志》卷二所指出的:

《王荆公日记》八十卷,……凡旧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诋毁。论法度有不便于民者皆归于上,可以垂耀后世者悉已有之。尽出其婿蔡卞诬罔。……故《神宗实录》后亦多采《日记》中语增修。

^① 陈左高:《中国日记史略》,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,第3页。

^② (宋)周密:《齐东野语·自序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4页。

故此后有陈瓘“以绍圣史官专据《荆公日记》以修《裕陵(神宗)实录》，变乱是非，不可传信，故居谏省，首论其事，进《日记辨》，乞改《实录》”。^① 于是那些参政类日记不仅成为攻讦政敌的利器，还是洗白自己的“备忘录”。如熙宁后期宰相王安石与参知政事吕惠卿交恶，御史中丞邓绾上疏弹劾吕惠卿，而吕惠卿反击的手段之一即是利用其平日所纂修的日记：

当是之时，惠卿进《日记》三策，其《进日记劄子》曰：“臣私记策子皆有其事，其事多出于陛下之德音与所亲闻，宜不废忘，而其文非一二日可以撰造者也。”神考察惠卿《日记》果非临时撰造之言，而邓绾之颇僻奸回果不可恕，于是赫然威断，发于圣批。邓绾既逐，而安石亦不得留矣。^②

本丛编所收录的参政类日记中，其撰者为宰执者有《钱惟演日记》、赵槩《赵康靖日记》、王安石《熙宁日记》、《刘摯日记》、吕惠卿《吕吉甫日记》、林希《林文节绍圣日记》、曾布《曾公遗录》、《王岩叟日记》、沈与求《沈必先日记》、赵鼎《丙辰笔录》、《丁巳笔录》、周必大《思陵录》、《彭龟年日记》等 13 种，在京臣僚或随驾官员所撰的有司马光《温公日记》、林希

^① (宋)朱熹：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十三之三《谏议陈忠肃公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827 页。

^② (宋)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七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条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第 6794 页。

《林文节元祐日记》、范祖禹《范太史日记》、李正民《己酉航海记》、赵鼎《建炎笔录》、晁公遯《箕山日记》、周必大《亲征录》、《龙飞录》等8种,地方官员所撰的有高永年《陇右日记》1种。因此类日记撰者多为宰执等高官显宦,对当时政务决断起着关键作用,故影响极大,而具有甚高的史料价值。如王安石《熙宁目录》,如上所云,哲宗绍圣年间的《神宗实录》即据以修纂,李焘修撰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也大量引录,成为后世研究“熙宁变法”的重要依据。又如周必大《思陵录》记录宋高宗去世丧葬过程尤为详实,其研究价值尤为后人所重视。

三、其他日记。

宋代日记,除上述两类以外,尚有记录个人日常生活者,如黄庭坚晚年贬谪宜州,记录其谪所生活而成《宜州乙酉家乘》;又如吕祖谦晚年居家养病期间,详细记录每日读书功课及物候,撰成我国古代第一部详细记录物候变化的《庚子辛丑日记》。有仅录一事之始末者,如嘉祐六年右司谏赵抃为殿试考官,记录殿试过程而成《赵清献御试日记》,成为研究宋代科举制度的重要资料;又如徐元杰于宋理宗朝任崇政殿说书时,记录其侍讲天子言论而成的《进讲日记》。

日记因其特有的撰写体例,实为记录历史事实的第一手资料。但由于党争等原因,故宋人日记中往往存在着日后增删、修改现象,从而影响了史事记录的准确性。但就是如此,宋代日记的文献价值,依然为世人所重视:因宋代日

记的撰者多知名士，此就为研究这些人的生活、履历等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珍贵史料，如欧阳修《于役志》，后人就屡曾据以考订欧阳修的生平。如周必大云：

乃如《年谱》皆说六一先生是景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丙辰生。前日搜访得《于役志》一卷，乃是自馆阁贬夷陵时再行日记，止到公安。其间于六月二十一日说“予生日为寿”。寻取《真宗实录》及《长编》再三契勘，果是丙辰乃六月二十一日，得戊申月节气。然则诸家考证容或未详。^①

明人杨士奇也考证道：

按《于役志》：九月壬辰，安道贬筠州；甲午，师鲁贬郢州；丁酉，余贬夷陵。《与高若讷书》云：“昨日安道贬官，师鲁待罪。”则余、尹被贬在公之先明甚。公诸子述《事迹》及韩魏公作《墓志》，皆以为公之贬在余、尹之先。魏公偶出一时之悞，或但据其子所述书之。而为子职者不密于考据如此，虽非大关涉，可以率略乎？^②

其价值可见一斑。其他如行游日记中颇有记载其游览时创

① （宋）周必大：《文忠集》卷一八八《孙彦揭谦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 （明）杨士奇：《东里文集》卷十《题欧阳文忠公事迹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作的诗词作品,往往可补其诗文集集中之缺载。此外,宋人日记中还多载撰者与当时名士的交游,也间接地保存了他人的生活资料,难能可贵。但因年岁久远,宋人日记大多已残缺、散佚,完帙甚少。故本丛编于汇集现存宋人日记之外,还自各类文献辑录有关宋人日记之佚文,编入本书。又将史籍中有所记录、但未见有佚文传世的宋代日记资料,收录于书后附录。

因受能力与所见资料限制,本丛编所收录的宋人日记及其佚文的搜辑,尚有疏漏,有待日后补充。此外,本丛编在辑录佚文、校勘文字等方面参考了不少今人相关研究、整理成果,因限于体例,未能一一注明,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顾宏义

2013年3月

凡 例

一、本丛编乃为宋人的日记著作之结集，所收宋人日记(包括存、残以及辑佚)计 55 种。由宋入元之人于元时所撰的日记不予收录。又宋人编年体杂史类著述，如李纲《靖康传信录》之类，也不收录。

二、各种日记以撰者的生卒年月为序编排。生卒年不详者，即以其主要活动年月为据编排。同一撰者的多种日记，即以其撰写年月为序编排。

三、本丛编所收各篇日记，皆于正文前简述其撰者生平、日记撰成年月及其内容、传世版本等情况。各篇日记末，酌收有关序跋、题记等，以助于阅读。

四、宋人日记完整流存于今者不多，大多已残缺，或已散佚。故本丛编着力收辑相关佚文，对有残卷传世者，即将所辑佚文附录于残卷正文之下，如司马光《温公日记》、曾布《曾公遗录》等；如原日记已散佚，即将佚文另列条目，而取著者所定之日记名，或历代通行之为标目，如王安石《熙宁日记》、范祖禹《范太史日记》等。

五、因相关佚文情况多端，故所辑得佚文，即依原书中之顺序编排，不再按日记体例，依其文字所述及之时间先后排列。

六、本丛编所收录日记,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,并酌校他本一二种,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,即不予校改,而有明显舛误、脱漏、衍文者,则以圆括号“()”标示其为误字、衍文,而以方括号“[]”标示其为正字、补字,但不另出校勘记。

七、又部分宋人日记,历代文献中曾有记载,但早已散佚,且无佚文可辑,故将其相关之记载附载于卷末“附录”,以便于阅读者。

目 录

凡 例	1
乘轺录	路 振 1
钱惟演日记	钱惟演 12
赵康靖日记	赵 槩 14
于役志	欧阳修 15
赵清献御试日记	赵 抃 22
使辽语录	陈 襄 26
温公日记	司马光 38
熙宁日记	王安石 94
刘摯日记	刘 摯 203
乙卯入国别录	沈 括 239
吕吉甫日记	吕惠卿 256
游城南记	张 礼 267
元祐七年正旦接送伴语录	吕希绩等 280
林文节元祐日记	林 希 283
林文节绍圣日记	林 希 286
曾公遗录	曾 布 293
范太史日记	范祖禹 574